

■玉渊杂谭

前几天,看到一则娱乐新闻,信耐力2016新年历年发布会,姚晨作为其中唯一的华人面孔出席活动,她也是这本全球顶级年度历史封面女郎。

我忽然想起了京剧大师梅兰芳。1930年2月,梅兰芳赴美演出,在美国一炮而红,两个星期的戏票三天内预售一空。京剧登上了美国的戏剧舞台。据说,梅兰芳每次演出结束,谢幕常常要多达十几次,人们都等着和梅兰芳握手。当时美国媒体评论是,“东方是东方,西方是西方,这对孪生

子从未相遇过,但现在他们毕竟相遇了,这一情况体现在梅兰芳的身上。”

当然,不必比较姚晨和梅兰芳的艺术成就,实际上,二者也不可比较。然而,从文化角度解读,这个娱乐事件也可视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路途上的又一块“人格化”基石。我所说的“人格化”,是指在文化传播尤其是对外传播过程中,那些具体的人物、作品或形象等文化符号,比抽象的理论、概念或典籍更具渗透力和传播力,它们往往构成文化接受更有效的“阶梯”。

■人物纪事

胡适“风骨”的背后



朱少华绘

谈及胡适的“风骨”,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在中研院就职典礼上,当众反驳蒋介石说:“你错了”。

余英时先生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此事:“他(胡适)在中研院院长时,当众说:‘总统错了!’私下更是侃侃而谈。尽管在学问上没有什么了不得,像我的老师都讨厌他,但是二十世纪真能继承‘以道抗势’的传统,他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。”

李敖在电视讲话中也说到胡适这次“可圈可点”的“疯狂”之举。李敖说:“蒋介石是多么凶悍的人,是多么不许别人讲话的人,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,任胡适先生出来指责他的错误,这个情况太少见了。”

胡适是个特别会说话的人,而且特别顾及蒋介石的“面子”,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蒋介石错了,让对方下不来台,这个情况也“太少见了”。

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?我们来听听见证人的现场描述。

当时的师范大学校长刘真,在回忆中说:“蒋中正总统为了表示对胡先生的尊敬,亲自参加胡适先生就任‘中央研究院’院长的典礼,因为‘中研院’的许多人与北大有关联,蒋总统就在典礼中对‘五四运动’颇有微词。胡先生则在蒋总统致辞完毕后,立刻对总统说:总统你错了,‘五四运动’纯粹是一种文化运动,与以后的‘左’倾思想与共产党活动并无很大的关系。”

胡适做人一向温和体贴,按理,即便他不同意蒋介石的看法,也可以私下商讨,有必要当众反驳,让老蒋下不了台?何况那天蒋介石是来为他胡适捧场的,于情于理,他都应该以更妥帖委婉的方式和蒋介石交流,而没必要正辞严当仁不让的。

倘若你以为,这是胡适要当众显示自己“以道抗势”的风骨,那完全是误会。胡适一向倡导容忍,对宁折不弯的风骨似乎并不欣赏。我以为胡适的冲冠一怒与当时由台大学生书局出版的《胡适与国运》有关。

1958年,胡适即将去台湾任职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夕,这本肆意辱骂他的小册子

这方面的例子很多,就拿较近的来说,2015年9月初,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卫·寇克剧场分别演出京剧《白蛇传》和《锁麟囊》,就被誉为创造了中国传统文化“人格化”对外传播的典范。

我以为,文化传播最高明的境界是似盐入水,如光洒地。百姓日用而不知的“文化”才是“文化传统”而不仅是“传统文化”意义上的“文化”,或者说,才是“活文化”“真文化”。从这个角度看,所谓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,绝不应该是博物馆式的陈列,也不

仅是“传统文化”的传播,而是“文化传统”之间的碰撞与互动,从而让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在各自的生活捕获一个活泼、直观、生动的“文化中国”。

这就需要一大批反映当下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,而在我们这个视听文化盛行的时代,文艺体育明星天然地在文化符号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。我们说起英国就想到贝克汉姆,说到美国就想到史泰龙、施瓦辛格,说到韩国就想到都教授,以及华人世界里早年的李小龙、巩俐到现在的姚晨,就是

这样一组文化符号。

此外,还有许多更有意义的当代中国文化符号值得挖掘和推广。比如,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莫言、药学家屠呦呦;再比如,多次复排的歌剧《白毛女》,广受好评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等等。只有把各方面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化符号充分挖掘出来,提炼其精神内涵,中国文化的传播才会更加便捷,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形象才会更加立体、更加丰满、更加富有时代精神。

文·尼三

■随想随录

难得“认真”

文·丁辉



文·魏邦良

的一生功绩一世英名,不就“谈笑间,灰飞烟灭”了,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做这个中研院院长。

可见,胡适是被逼无奈才当众驳斥蒋介石,或者说,他说蒋介石错了,其实向台下的听众表明他对《胡适与国运》的态度,也就是绝不承认那本小册子对他的如攻击:是胡适把青年推给了共产党,是胡适让国民党失去了大陆。

国民党政权的失败,完全归咎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,不得民心,可他们却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过错,反而鸡蛋里面挑骨头,想搞“文艺复兴之父”胡适背黑锅。蒋介石请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,是为了借重他的国际声望,但又想通过《胡适与国运》给胡适使脸色,暗示启用他是不计前嫌,格外开恩。一面拉拢,一面警告;表面吹捧,暗中辱骂。对于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总裁,胡适涵养再好,也忍不住当面驳斥了。

正大光明的批评,胡适欢迎。但对方却阴阳怪气指桑骂槐,一个堂堂的总统竟然与下流的小册子沆瀣一气,这种情况下,胡适也确实没有必要给对方面子了。如果一个政府一败涂地,却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,竟无端怪罪于一场文化运动,迁怒于一个伟大书生,那胡适还能忍吗?还有必要忍吗?

胡适当众说蒋介石错了,不是无所畏惧展示风骨,而是无路可退捍卫底线。

悄然出炉。台湾《中央日报》4月5日刊登一则短讯曰:

“台北今日各机关多接到由邮局寄到之《胡适与国运》一书,刊载攻击胡适之先生的文字。行政院秘书处业已函请治安机关从速予以查究。甚望各界人士,勿受其愚。”

这则短讯明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倘若当局真想查禁这本小册子,简直易如反掌。其实,当局默许这本小册子出炉,就是想借此给胡适来个下马威。随后在报上发表这段话则是为了撇清此事和国民党的关系,其实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。这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,想来胡适心知肚明。

4月9日,胡适刚下飞机,就有人问起这本《胡适与国运》。胡适答:“我在东京看到中央社的电文,两位作者我都没听说过,都很陌生,如果以前在北大同过事,我也记不起来了。”

胡适没有读到该书内容,所以未发表意见。

当晚,代院长李济来看胡适,临走时留下了一本《胡适与国运》。

这本小册子充斥的不过是对胡适泼妇骂街式的辱骂,肆无忌惮,阴险恶毒。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说,因了胡适提倡、推广白话文,“打倒孔家店”,使很多青年读不懂文言文,失去了廉耻自尊之心,精神空虚,转而投入共产党。换言之,胡适主张反孔,就

是毁灭中国文化,从而让国民党失去了青年,并最终失去了大陆。

蛮横无理的攻击,丧心病狂的辱骂,虽虚张声势却不堪一驳。胡适没想到的是,翌日,在就职典礼上,蒋介石对“五四运动”的看法和那本下流的小册子如出一辙,比如,认为“五四运动”摧毁了传统文化,“五四运动”导致了共产党的壮大等等。如果此前,胡适没看到这本小册子,他会考虑到蒋总统年事已高,看问题难免出错。他完全可以会后、私下和蒋介石就此问题进一步探讨、商榷。可现在,当蒋介石重复了那本小册子的观点,其实就是国民党高层的看法;那本小册子的出炉,仗仗的就是国民党的暗中支持。而台下坐着的包括李济在内的学界同仁、政界精英应该都已看过那本书。那么,默认蒋介石的看法,就等于承认那本小册子对他的辱骂与攻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。

这是胡适无法容忍的。本来,胡适无需在公开场合谈论《胡适与国运》对他的辱骂与攻击,因为那是一本偷偷出版的书,而且官方报纸已经表明要对其“予以查究”。可现在,大庭广众之下,蒋介石以委婉而间接的方式表明了那本小册子的核心观点非常正确,如果此时胡适不当众驳斥蒋介石,那他胡适还如何面对他的下属。如果默许蒋介石否认“五四运动”,否认白话文,那他胡适

永远的高士其

文·李宗浩

在我国著名科学家、科普作家、中国现代科普事业的拓荒者高士其诞生110周年之际,相关的几个纪念活动陆续举办,我的新书《永远的高士其》也得以出版。对我来说,这无疑是对高老最好的纪念,最好的缅怀。

高士其年轻时留学美国,不幸在实验室里遭受病毒侵袭,由此被疾病、瘫痪缠绕了半个多世纪。归国后,他在艰难岁月里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超人毅力创作出《菌儿自传》《生命的起源》《天的进行曲》《生命进行曲》等数百万字的优秀科普作品,影响了好几代人。

我在少年时代读到《菌儿自传》,被作者对细菌这种拟人化的别出心裁的描绘深深折服。他把那看不见、摸不着的细菌写得似“小人国”里的众多百姓,富有个性,栩栩如生。《菌儿自传》这本我最喜爱的科学读物启蒙了我的思想,在我面前敞开了科学与文学结合的道路。来到北京后,我有幸与高老会面,并成了忘年交。难以忘怀,在“科学的春天”里,我们两人合作,给邓小平同志、方毅副总理呈上关于提升全民科学文化水平的建议,向胡耀邦总书记提出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”加强儿童科普工作的意见,商讨建立中国科普作协等重大事项,探索科普创作的一些具体问题。直至他1988年离世,我与他相识相处了32个年头。

近些年来,我在忙于急救、灾害医学救援专业工作的同时,更加感受到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。总体而言,我们奉献给社会的科普作品质量还不是很高,不能适应信息“爆炸化”“碎片化”时代的需求;更重要的是,新一代科普创作人才的发掘和培育工作也亟待加强。由此我萌生了一个想法:应该做点事情,将高士其身残志坚、矢志科普、认真创作的事迹传承下去。

而促使我写《永远的高士其》的直接原因,则是2012年10月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作家叶永烈的交谈。那天,这位老朋友对我说,他的旧著《高士其爷爷》就要修订重印了。我连声说好,但他却叹了口气说,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多不

知道高士其是谁,所以书名要改。我说这个书名其实挺好,要不干脆就改为《高士其》。他笑道:被改成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我立即表示赞同:我们青少年时代就是把身残志坚、矢志革命的苏联英雄保尔·柯察金作为榜样呀!但叶永烈却说,这个书名还是不行,他“卖关子”要我继续猜。我挖空心思依然猜不出来,最后他直言:书名改成了《中国的霍金——高士其》。顿时,我脑海里一片空白。

史蒂芬·霍金是英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,他在21岁时(1963年)被诊断出“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”,后来身体每况愈下,被牢牢地禁锢在轮椅上,仅有几根手指可以活动,然而,霍金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科研并作出了巨大的科学贡献,还写出了《时间简史》《果壳中的宇宙》等全球热销的科普作品。我觉得,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宣传、介绍霍金的事迹完全应该,他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确实也鼓舞人心。这里我想说的是,对我们民族自己的优秀科学家和科普作家,我们也不该忘怀,而更应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。往“大”里说,我们的文化不能断层,被誉为“中国科普的旗帜”、堪称“中华民族英雄”的高士其更不能被时间封存。

不久,我在参加湖南出版界在京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及此事,中南出版集团总经理丁双平对我的发言颇有同感,他说:“高士其先生的事迹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,我们有责任把高老的为人和作品延续给后代,不能被历史淹没。”

随后,我以上世纪80年代初由高老亲自指导审定,有众多权威专家参与,我编著的《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》为基础,写成了《永远的高士其》。这本书融进了30年来的时光变迁,探讨了诸多问题: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当下,新媒体时代里,原创的科学作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,大量的、碎片化的科学信息如何处理,速读时代是否还需要经典……

高士其不仅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。“永远的高士其”,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■艺苑



邓颖超与高士其(油画)

杜爱军

1978年3月,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从医院赶到全国科学大会会场,会议期间与国家领导人邓颖超亲切握手。

亚洲双年展亮相羊城

科技日报(记者唐婷)“亚洲”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时空概念。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、艺术生态的开放,亚洲文化逐渐走向世界前台。12月11日,在广东美术馆开幕的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,将为您奉上一场聚焦“亚洲时间”的视觉盛宴。

日前,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首届亚洲双年展总策展人、广东美术馆

原馆长罗一平对本次展览的主题“亚洲时间”进行了阐释。他指出,这一主题探讨了矛盾的两方面:一是西方的、全球角度的“世界时间”,包括加速、急速、可见性等;二是与之相对的“亚洲时间”,包括平静、思考、多样的现代性等。由于东西方的内在冲突及相互依存性,东西方矛盾或许也带来了一种必需的竞争性刺激,而这塑造或重塑了当今亚洲对时间

的发现与感知。

罗一平表示,本次展览希望能引起对现今“世界时间标准”的反思,其目的并不在于以另一种时间形式取而代之,而是要破除仿佛与之有本质联系、以自我中心、排他和扩张的逻辑。因此,展览主要着重于当地视野对亚洲时间的理解,最终目的则是以亚洲视野重新校准现存的“世界时间”基准。